

全球能源版图调整与中国—中东能源命运共同体建设

查道炯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为深化和拓展我国的能源国际合作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中国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建命运共同体，努力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这一总体的战略性要求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与中东地区各国的能源共同体建设。全球能源版图在变化，中东地区自身也在寻求应变。从中东地区获得足量、稳定的能源供应，应该成为中国重要的而不是唯一的目标。通过参与中东地区的核能、可再生能源等能源项目建设，为该地区国家的能源供应多元化作出贡献，应该是能源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必要选项。

关键词：能源 中东 风险 能源命运共同体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时先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合称“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重大战略构想，为深化和拓展我国的能源国际合作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在众多的境外能源供应来源地中，中东地区的权重将长期保持高位。因此，本文努力探讨“一路一带”框架下，中国与中东地区的能源命运共同体建设课题。

一、全球能源版图调整：美国走向“能源独立”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东地区一直是全球的能源中心。世界上多数大国都需要从中东源源不断地进口石油。2011年美国成为石油类产品净出口国，这是该国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能源供需状况变化中62年来第一次。虽然在2011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第一大原油进口国，国际间的诸多研究机构都开始讨论美国“能源独立”及其对全球油气格局带来的可能影响。

判断美国走向“能源独立”趋势的主要依据包括以下四点。

（一）随着技术进步，非常规油气资源可以向常规油气供应转化

从油气开采的技术和经济角度界定，常规油气是指应用现有技术方法能够经济有效开采的油气资源。非常规油气是指现今无法用常规技术方法进行经济性勘探开发的油气资源，资源规模大，储层物性差。一般认为，世界上常规油气资源比例一般占20%，非常规油气占80%。2010年和2011年美国非常规天然气中的页岩气产量分别为1378亿立方米和1800亿立方米，分别占美国天然气总产量的23%和34%。从此后的美国自产天然气来源构成看，页岩气的贡献呈持续上升趋势（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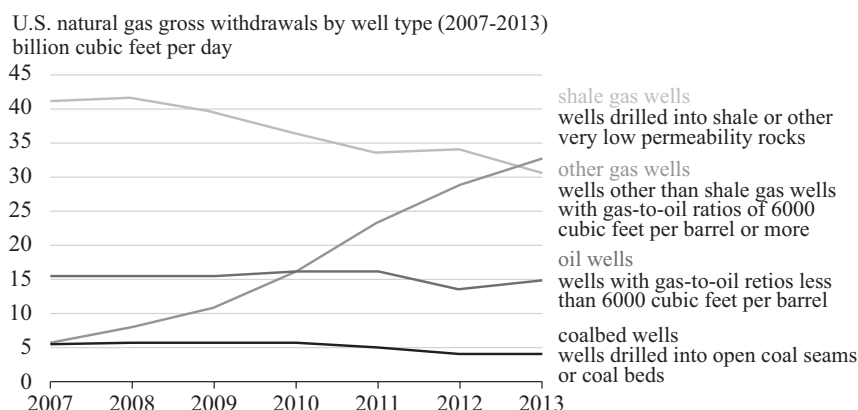


图1 美国的自产天然气来源构成（2007—2013年）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U.S. Energy Information Agency）。图中右侧的英文对曲线的解释，从上到下依次为：页岩气井、其他气井、油井、煤层气井。<http://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cfm?id=18951>，2014年11月29日登录。

（二）北美地区有望成为全球能源生产的“新轴线”

借助于开采技术的突破，从加拿大艾伯塔省的油砂，经美国北达科他州和得克萨斯州的页岩气，到法属圭亚那沿海的一处新发现的大油田，最后到达在巴西的深海“盐下油”，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储量，有了新的评估。加拿大艾伯塔省已探明的石油可开采量为1693亿桶，约占全球原油储量的12%，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储量，这些石油99%存在于油砂。加拿大1967年即开始进行油砂矿的商业化开采。最近几年，随着技术创新，油砂开采取得重大突破，目前加拿大油

砂产量每天超过150万桶，十年后则可望翻一番。加上加拿大其他石油产量，加拿大将超过伊朗，成为世界上仅次于俄罗斯、沙特、美国和中国之后的第五大产油国。

在美国，北达科他州和得克萨斯州蕴藏有丰富的页岩气（页岩气也可转化为油）。根据美国能源部情报局的数据，美国可开采的页岩气达862万亿立方英尺，可满足美国100年的需求。2000年美国页岩气产量折合成石油约为每天20万桶，仅占美国国内总产量的3%，但目前开采量已达到每天100万桶，到2020年，这一产量将达到300万桶。按照一些美国能源专家的判断，借助于页岩气开发，美国数年后甚至可能取代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国。

在巴西，随着勘探技术的深入，在过去几年，接连发现多个海上大油田。这些属于盐带下层的石油储量可能高达1500亿桶。按照目前的开发速度，到2020年，巴西日产石油将达到500万桶，相当于沙特产量的一半以上。届时，巴西将取代委内瑞拉，成为拉美最大的石油生产国。

（三）美洲邻国已经成为美国原油进口来源的主力

如表1所示，自2003年到2013年的十年间，美国原油进口的头十个来源国中，一半来自美洲。其中，在2013年，头位原油来源加拿大占美国总进口的比例（33.3%）是第二位来源沙特阿拉伯（17.2%）的一倍。其余两个中东石油来源（伊拉克和科威特）对美国原油进口的贡献，都在4%左右。

表1 美国的十大石油进口来源国所占比例变化（2003—2013年）

国名	进口量（百万桶/天）	2013年占总进口量比例	自2003年以来的变化
加拿大	2.57	33.3%	65.8%
沙特阿拉伯	1.33	17.2%	-23.2%
墨西哥	0.85	11.0%	-45.8%
委内瑞拉	0.76	9.8%	-36.2%
哥伦比亚	0.37	4.8%	121.1%
伊拉克	0.34	4.4%	-29.1%
科威特	0.33	4.2%	56.7%
尼日利亚	0.24	3.1%	-71.3%
厄瓜多尔	0.23	3.0%	64.0%
安哥拉	0.20%	2.6%	-44.4%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整理。

促成美国原油进口国别来源变化因素众多。既有石油生产能力、石油加工链条中的油品与提炼设施的匹配、油田因技术维护需要而调整产量、运输途径保障和运费等市场因素，有石油金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因素，也有进口国因政治和外交需求而偏好或打压某个具体油源的因素。

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美国能源独立”的舆论甚嚣尘上，美国在2014年的自产量与进口量基本相当。也就是说，未来——不论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还是为了追求美国在全球油品以及化工产品贸易中的利益——美国并没有以国别为标准而从事排他性地进口的选择。类似“世界石油能源的轴线从东半球转向西半球”的判断，是否能够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还有待观察。

（四）“西半球能源市场”的经贸制度性保障

伴随美国自产能源能力的提高，以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为核心成员的西半球能源市场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相对独立程度在提高。对美、加、墨三国而言，如何将各自的出口和进口需求，通过贸易条约等制度性安排稳定下来，是具有共通性的能源和整体经济利益保障的途径。设立以三国为成员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并在其中规定能源条款以保障加、墨的石油能源得以长期供应美国市场。这是北美三国间能源关系安排的基本逻辑。

1994年1月1日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能源条款在第二部分货物贸易的第六章。具体内容以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能源条款为基础进行了完善。其主要条款包括禁止在任何情况下实行任何形式的数量限制、最低或最高出口价格的要求，除非当执行反补贴和反倾销命令时，禁止实行最低或最高进口价格要求；任何成员方不能对任何出口到另一个成员方的能源或基本石油产品采用或保留任何的税收和费用，等等。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成员国之间的能源贸易安排具有战略性。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成员国之间的能源贸易安排具有战略性。这种战略性体现在成员国之间在能源贸易领域的相互优先。协议不仅保障了美国能够以符合美国需求的“公平合理”价格获得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油气和其他能源资源，也通过为美洲能源经济区的形成奠定法律和政策框架的途径提高了整个北美地区应对全球油气供应态势变化的相对独立程度。¹

归纳起来看，美国自产能源量的上升，释放了全球油气供应市场的空间。也是2014年全球贸易油价大幅下滑的重要物质诱因。未来美国的“能源独立”之路，同样会受到全球能源金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没有可做出不可逆转的结论的基础。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美国战略盟国而言，更值得关注的是北美和南美能源

¹ 参阅查道炯：“北美能源局势的变化与中国的能源安全”，载史丹主编：《中国能源安全的国际环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

市场之间的制度性安排。从我国能源外交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美洲能源自我供给能力的变化，仅仅是全球能源贸易态势中的重大变量之一。近40年来，中国在没有能够从美洲获取大量油气供应的情形下，做到了维护自身的能源安全。面对可能出现的未来，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自信。

二、全球能源版图调整：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挑战与机遇

一方面，美国能源独立取得重要进展，减少了对中东地区的依赖。从地缘政治学的教科书理论层面看，这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调整提供了巨大空间。中东、北非地区一些产油国政局动荡和存在战争风险，给全球石油市场带来不确定性。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耗国，且以中东地区为主要进口来源。统计显示，2013年，中国从海湾国家进口原油9912万吨，约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35%。这样，中国不得不面对全球石油消费中心东移，生产中心西移；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正成为新的石油消费中心的新格局。也就是说，似乎可以肯定，中国所要面临的挑战大于机遇。

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必要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对新格局做出适切的判断。

（一）能源地缘经济态势的发展，有利于强化能源作为中国与中东北非地区的经贸纽带

受欧美发达国家石油供应来源多样化战略和国际石油市场板块化的影响，过去10年，海湾国家逐渐失去了美国和欧洲第一大石油供应来源的地位。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石油需求的迅速增加，恰恰为中东北非国家寻求长期稳定的石油出口市场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

（二）从能源产业链条的角度把握中国的进口需求

国内外对相关态势的观察，多半集中在中国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的变化以及相应的对进口油气的需求。2014年，国际原油价格以30%的幅度下滑，其中一个公认的原因便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进入了“新常态”（即：在重视总量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包括环境成本控制在内的质量追求）。其实，影响中国经济对进口原油的需求的一个产业内因素是中国的原油加工产能。

2009年中国的原油一次加工能力由2000年的2.76亿吨猛增至4.77亿吨，激增了72.8%，稳居世界第二。2011年中国原油年一次加工能力达到5.4亿吨，2012年达到5.75亿吨，2013年突破6亿吨。如果目前在建、拟建和规划中的炼油项目全部建成，2015年底我国炼油能力将达到7亿吨。¹ 原油加工产能的增长，

¹ 陆鱼：《我国炼油进入“6亿吨时代”》，《中国石化报》，2013年8月13日，第5版。

解释了2014年为什么中国的进口总量增幅较小，而同年成为石油产品的净出口国。至2014年10月，中国表观石油需求同比上升2.9%至4265万吨（平均每天1009万桶），环比下降2.5%；本年度前10个月，中国总体表观石油需求为每天996万桶，比去年同期增加2%。中国10月成品油进口量同比大幅下降22.2%至228万吨，而出口量却大幅上升30.3%至314万吨，中国在10月成为成品油净出口国，净出口量达到了创记录的86万吨。

在炼油产能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炼油工业规模化、一体化和集约化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产业背景下，未来驱使中国进口的力量之一便是满足国内炼油和化工产能的需求；总体经济状况变化仅是进口需求刚性的来源之一。

（三）全面认知美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的油气与战略利益追求

正如曾任美国外交委员会研究员的瑞秋·布朗森（Rachel Bronson）对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历史回顾所得出的观察，美国在中东和北非的卷入程度主要受三大因素影响，一是油气，二是宗教，三是军事设施。¹ 宗教因素是指支持和维持中东各国政权中的世俗力量不被激进的伊斯兰力量所取代，在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出现矛盾时，坚定地站在犹太教这一边，同时兼有保护并扩大中东地区基督教力量的努力。军事设施因素是指美国在中东部署军事力量，一方面是维持在当地的军事威慑力，另一方面将中东作为向地区外投放军事力量的基地，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冷战期间，美国与前苏联对抗，冷战后攻打、占领阿富汗，没有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是不可能完成的。现代武器也受到作战半径限制，开战在即才从美国本土发送武器装备、组织地面部队，是临阵抱佛脚。美国军方为准备未来可能的中东地区之外战事而部署基地的做法，需要纳入我们观察的视野。这三个因素相互交织，又各具结构性。

若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存在理解成仅仅“为石油而战”，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也就是说，若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存在理解成仅仅“为石油而战”，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面对国内外种种中国取代美国在中东北非地区“履行国际责任”或“填补战略空间”的舆论鼓噪，中方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更为适切的判断。

（四）认知美国对中国与沙特阿拉伯交往的关注点

在中东石油出口国中，沙特阿拉伯所处的独特地位一直为国际能源观察界所公认。近半个世纪以来，沙特阿拉伯一直承担着国际石油市场最大“机动国”的角色。目前，沙特阿拉伯拥有1250万桶/日的原油生产能力，石油产量一般在

1 Rachel Bronson, *Thicker Than Oil: America's Uneasy Partnership with Saudi Arab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900万桶/日至1000万桶/日之间摇摆。当利比亚减产时，沙特阿拉伯曾通过增产弥补市场的空缺；当利比亚的石油重回国际市场时，沙特阿拉伯则通过减产来调节市场供应量；当利比亚再次减产，沙特阿拉伯又再次增产。同样地，当伊朗受到制裁时，沙特阿拉伯也采取了增产措施。沙特阿拉伯一直是当今国际石油市场一个较为机动的力量，维护着市场的稳定。不难理解，沙特阿拉伯是大国对中东石油外交的重要争取对象：即便不是为了直接从沙特获取油气，也有必要通过密切与之交往而提高把握全球石油产量变化态势的能力。

早在十年前，美国国际战略研究界就出现了对“利雅得—北京战略轴心”形成的忧虑。¹ 在国际贸易层面，该种忧虑的基础是：当沙特和中国的关系密切到双方同意用人民币结算油气贸易的程度，那将是对美元作为国际大宗商品结算货币的统治地位的致命性打击。在军事安全层面，当中国与沙特之间出现武器贸易时，美方会视为对其在中东霸主地位的直接挑战。

这并不是说中国对沙特的外交需要以美国的关切为向背。而是提醒我们自己：政治与经济因素的紧密交叉在中国与沙特的关系中尤为复杂。中国要加强研究，慎重行事，降低不利因素。

（五）从伊朗的对外合作合同模式入手处理好中资的投资进度²

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一直因受到西方制裁而未能得到充分释放。这一方面给中资企业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从政府外交的角度，也应充分把握经营伊朗油气开发市场的独特挑战。

伊朗实施的是在全球能源开采与服务中独特的回购（buy back）合同模式。外资石油公司在伊朗回购合同模式下的地位，是一个带资打工的产能建设总服务商，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业主。真正的业主，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ational Iranian Oil Company, NIOC）。

伊朗的回购服务合同，不同于委内瑞拉早期的增产服务合同，也不同于秘鲁、厄瓜多尔曾经有过的服务合同，与苏丹产品分成合同也有很大差别，更不同于哈萨克等地的公司制许可证合同。其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五个“一定”，即合同者是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以一定的投资、完成一定的工作量、达到一定的产量，实现一定的回报。”在满足前四个“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实现最后一个“一定”（即结果）。

从回购合同实施11年来的情况看，参与伊朗石油项目的各国公司，包括法国的道达尔公司（Total）、意大利的艾尼公司（Eni）、日本的国际石油开发帝石株式会社（Inpex）、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越南的越南

1 Gal Luft & Anne Korin, "The Sino-Saudi Connection," *Commentary*, March 2004, pp. 26-29.

2 本节的写作基础是本课题成员，长城钻探公司伊朗测井作业区行政经理朱丹先生提供的专题分报告。

石油公司（Petro Vietnam）等，几乎没有任何一家能在伊朗实现四个“一定”的前提，预期“一定”的利益都相应受损。

回购合同是伊朗针对所有进入该国的外资而实施的唯一模式，对中资没有例外或优待。基于此，未来有必要审慎推进一些中资油气企业在该国“做大中东”的举措。对企业而言，回报收益必须是投资进度最重要的指标。唯有如此作为，才能使一家企业在国际市场获得尊重，也才能对整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作出正面贡献。

综合来看，我们不妨认为，要给出一个类似“机遇”与“挑战”孰重孰轻的判断，并不存在逻辑基础。但是，可以说，机遇主要体现在贸易领域（作为进口方所面对的竞争态势），挑战主要体现在投资领域：在市场准入和项目运营环节，以伊朗市场为例，中资企业所面对的竞争态势，并没有因为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化而更“友善”。此外，本文认为，中东市场的美国因素是多元的，也将是一个长期存在，不会因为美国从该地区进口比例的下降而减少，更不会消失。

三、能源生产全球化背景下，中东国家的自我调整¹

作为全球油气投资目的地，中东地区的吸引力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原因之一是国际油气生产商在担心该地区逐年下降的石油储量。原因之二是主要中东产油国的能源政策。原因之三是政治和社会环境动荡。

作为全球油气投资目的地，中东地区的吸引力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原因之一是国际油气生产商在担心该地区逐年下降的石油储量。2013年中东石油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48%，而2005年这一比例是56%，1993年则是64%。而从1993到2013年的20年中，中东国家的油气储量增长了1%，而世界其他地区则增长了4.2%。从总产量变化情况看，路透社2013年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数据显示，海湾和阿拉伯地区的石油产量占全球石油产量的33%，天然气产量占到17%，其增长幅度持续三年持平。

原因之二是主要中东产油国的能源政策。其中，沙特阿拉伯的油气资源仍不对外国公司开放；伊朗虽然受国际制裁的影响明显，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让外资却步的“回购合同”要求。伊拉克是第三个主要资源丰富国家，但其政府的政策执行力之低，有目共睹。

原因之三是政治和社会环境动荡。制约伊朗油气产量变化的外部制裁，短期没有取消的机会。叙利亚和伊拉克则是深陷内战和冲突之中。这使得跨国油气巨头在中东地区开采的人员、设备等安全成本急剧上升。油气公司不把鸡蛋放在一

¹ 本节内容主要参考了加璐、安林红、张兵：《中东油气产业现状与发展前景》，《当代石油石化》，2012年第2期，第38—45页。

个篮子里，实施多样化的经营策略。

以常规天然气为例，主要的天然气出口国澳大利亚正在建设多个液化天然气（LNG）项目，未来5到10年内，将有十几个大型液化天然气项目陆续建成投产，届时总产能将达1.1亿吨/年以上，预计到2017年将取代卡塔尔成为世界第一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肯尼亚、坦桑尼亚以及莫桑比克等东非国家已探明天然气储量约253万亿立方米，莫桑比克有望于10年后成为世界第六大天然气出口国。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面对总体不利的国际能源格局，中东国家在努力应对。例如，在天然气利用方面，中东海湾国家根据各自的资源状况制定了不同的天然气产业发展战略。沙特开发利用天然气是为了节约石油消费，出口更多的石油，同时以天然气为原料大力发展石化工业，增加天然气资源的附加价值，因此生产的天然气全部用于国内消费，不出口天然气。卡塔尔和伊朗拥有巨大的天然气资源，因而采取了全面发展天然气产业的战略，既鼓励国内消费天然气，替代石油消费，增加石油出口，也利用廉价的天然气原料大规模发展石化工业，同时又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出口计划，使天然气生产和出口成为与石油产业并驾齐驱的国家支柱产业。伊拉克计划增加天然气产量用于石化生产与出口，以减少对石油的依赖。阿联酋和阿曼鼓励国内天然气消费，天然气消费量快速增长，今后两国将从卡塔尔或伊朗等国进口更多的天然气供国内消费或转变成液化天然气出口。科威特和巴林的天然气产量则全部用于国内消费，但随着国内天然气消费量的增长，今后将大量进口天然气。

预计2015年，海湾地区对天然气的年需求量将达4400亿立方米，其中用于发电和海水淡化的天然气消费将以8%—10%的年均增长率增长，使发电和海水淡化用天然气的需求占需求总量的50%，工业用天然气占需求总量的35%，其他15%用于油田注气进行气驱，提高油田采收率。

沙特拥有海湾地区最大的炼油能力，也是海湾地区最主要的油品出口国。为扩大油品出口，沙特专门建设了3座出口型炼油厂。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沙特实施了为期十多年的炼油厂全面扩建和升级计划，总投资160亿美元，是世界规划最大的炼油改扩建项目之一，在加氢裂化、催化裂化和焦化装置上大规模投资，旨在提高原油转化率，改善油品质量和油品结构，发展国际化经营，使沙特成为炼油大国和强国。目前，沙特有7座炼油厂，炼油能力约10560万吨/年，居世界第9位，每年出口油品5000万吨以上。沙特正进一步扩大炼油能力，升级改造炼油厂，并在国内或国外新建炼油厂。

伊朗的炼油能力居世界第15位，在海湾地区居第2位，目前共有9座炼油厂，炼油能力为7255万吨/年。伊朗将对部分现有炼油厂进行扩能改造，尤其是多产国内短缺的汽油产品，同时提高油品质量。扩建项目主要集中在增加催化裂化能力，减少燃料油产量、异构化提高汽油质量和馏分油加氢处理降低柴油硫含量等。

发达国家的炼油投资重点集中在炼油厂升级改造，提高深度加工能力和综合配套能力，以满足严格的汽柴油环保质量规格要求。而沙特和科威特等海湾产油国，利用手头积攒的石油美元和丰富而廉价的石油资源，陆续推出一批大型炼油厂项目，提高自身的炼油能力。沙特和伊朗的能源政策目标，不仅仅是扩大原油市场，而是努力提高资源的附加价值，并借此强化国际经营战略。

本文之所以选择这些信息，是为了提醒我国相关的决策部门一个现实：中东油气出口国家多年来在努力创造自身在全球油气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通过创造附加值而应对原油贸易态势（产量和价格）的变化。同时，中东地区的石油加工市场的变化，是全球范围内变化的一环。我们因此而有必要动态地跟踪形势，寻找其中的缝隙机会。

四、中国—中东地区的能源命运共同体

（一）在向全球开放的视野中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

如前所述，中国对境外化石能源的持续稳定供应需求，部分因国内业已建成的炼化能力所致，具有刚性。与此同时，而中国的化石能源进口来源对全球开放；中东地区国家的化石能源出口也是对全球开放的。因此，中国与中东地区市场之间，在原油、成品油、化工产品、液化天然气等化石能源贸易领域，其根本性出发点，不应是、也不可能是建立起某种供应量方向的政策安排。双边贸易的结构性稳定，才应是共同体建设的首要目标。

（二）将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GCC）自由贸易区建设作为稳定双边贸易的基础性工具

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自由贸易谈判也已进入第十个年头。中方应更积极主动，加速完成谈判并批准实施，使之成为共同体的机制性载体。在中韩、中澳自贸区相继结束实质性谈判，中美在双边投资协议谈判时间表进一步明确背景下，中方更为主动地推进与海湾合作委员会之间的自贸区建设谈判，将有利于应对中东国家对其在中国整体对外经贸关系中的地位变化的关切。

（三）将促进双向直接投资摆在共同体建设更为突出的位置

中国对中东国家的经济外交思维，必须走出如何稳定和扩大中国从该地区石油和天然气进口这个狭窄的议题。其实，即便是在化石能源领域，上下游合作、装备和技术服务出口等油气产业链条中的各个环节，也应是中国与中东能源关系的必要内容。在与包括中东投资来源互动的过程中，中国应着眼于如何有利于提高自身石化产品的附加值。

基于国内的产业状况与发展趋势（过剩）的需求，对中东地区的能源外交应

拓展到促进中资参与该地区各国的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工程建设，海外承包工程市场（铁路、港口、电站、房建、路桥、市政、电信等诸多领域）等领域。政府在谈判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自贸区的同时，有必要把保障和促进投资纳入谈判内容。

（四）从长远着眼，坚持不懈地参与中东地区的民用核能建设竞争

2014年11月，中国国家核电、西屋公司和土耳其国有发电公司（EUAS）签署合作备忘录，启动对包括在土耳其建设 CAP1400 核电机组等内容的排他性谈判。这一进展，是我国外交部门协助有国际竞争力的中资企业走进中东能源市场的重大成果。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中资企业进入中东核能市场的力度。而这种拓展，需要遵循核电建设过程本身的规律，不因一时一事的挫折而后退。

同时，我国政府应加大力度，推动中国的企业在中东地区从事风能、太阳能项目建设。中国在促进中东国家能源建设多元化领域所做的具体项目越多，为相关国家和社会创造环境福利越多，也就越有利于营造中资企业在当地经营的社会环境。

（五）加大中资企业在中东地区管理政治风险的力度

利比亚撤侨、在数个中东市场上出现的大型工程合同纠纷等现实，提醒我们：我国政府的职能部门有必要促使中资企业提高其政治风险管理水平。通过与国内企业的互动，形成一种新的共识：企业必须是风险管理的主体；通过提高尽职调查水平，用好、用足政府间投资保护机制，通过细化合同，将政治风险管理内在化；运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行业市场力量应对企业间的争端，降低对政府外交斡旋的成本，甚至需求。唯有政府外交和企业管理部门、企业主管、境外工作团队之间强化在制度性保障层面的互动，才能提高日常性风险管理水平，处世不惊，应对自如。

（六）创造良好舆论环境

与中东地区国家和社会的政府、企业、学术机构、民间多种力量一起，以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和途径，广泛宣传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1+2+3”合作格局中的早期收获，以促进“民心相通”，提高中国在该地区社会的软实力，为中资企业在该地区经营所面临的激烈国际竞争创造良好舆论环境。在这个议程上，中国政府应该鼓励并督促中资企业摒弃“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惰于与其经营项目所在地社会（以及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沟通的传统。

（七）中方主动寻求与美国、欧盟以及其他域外大国展开中东经济和安全事务的沟通、寻求三方合作

这种努力，并不仅仅是为了减少来自其他大国、针对中方与中东建设命运共

同体努力的阻力，其实，地缘政治思维下大国竞争的惯性，很有可能不会因中方的良好愿望而减弱。但是，这种举动所展示的是中方的自信：随着我国国际经济地位、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已从原来的“追随者”转变成为“塑造者”。中方不将中东作为大国竞争的场所，也通过三方合作探讨，敦促其他大国与中方一道，为中东的稳定和发展贡献正能量。

结 语

与包括中东地区国家在内的各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在我国政府外交和相关部门的领导下，已经有了包括“1+2+3”在内的顶层设计，合作的方向和目标也已经很明确。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做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的总要求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与中东地区能源共同体建设的努力。

本文从学术观察的角度，围绕能源共同体建设，提出三个基本观点：(1) 全球能源版图在变化，中东地区自身也在寻求应变；(2) 从中东地区获得足量、稳定的能源供应应该是中国的重要而不是唯一的目标；(3) 通过参与中东地区的核能、可再生能源等能源项目建设，为该地区国家的能源供应多元化作出贡献，应该是能源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必要选项。

总而言之，面对种种不确定性，稳健的对中东能源外交决策，应该建立在我国自身政府与企业（包括国内高管和境外主管）之间在政策层面的充分沟通基础之上，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相互促进。通过将每一个具体投资项目做稳、做实，将共同体的理念落实在中国和中东地区的大地上。